

在矛盾漩涡中挣扎的柔情^{〔*〕}

——以《一位女士的画像》为例

○ 张小曼, 桂 宝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亨利·詹姆斯以塑造女性人物见长,其人物形象复杂多变,内心刻画丰富细腻。深入分析这些女性人物的性格、命运与反抗,可以帮助我们窥探詹姆斯的内心世界、创作动机与作品旨归。形形色色女性形象的背后,激荡着詹姆斯悲天悯人的作家情怀。詹姆斯描写她们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真实处境、情感生活和心路历程,体现了对女性的关注和深思,传达出对社会、对人生的道德探索,也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自己在矛盾漩涡中挣扎的柔情。这种挣扎的柔情,又可以追溯到其本人的家庭环境、个人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它们共同作用,使詹姆斯的文本浸染上浓重的男权文化的阴影。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女性形象;挣扎的柔情;男权文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5.021

一、引言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作为闻名世界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开创现代小说的新纪元,独特的匠心和多变的风格,体现了英美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特色,在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深远。詹姆斯信奉多元文化,关心民生疾苦,喜欢游览欧美各地,谙熟世间百态风土人情,对欧美父权制的社会流毒耳濡目染烂熟于心。作为一名男性作家,詹姆斯却对女性题材情有独钟。在他的生花妙笔下,众多女性形象一一绽放,其身份殊异,性格迥然不同,但内心世界却是

作者简介:张小曼,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桂宝,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

〔*〕本文受2014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4D140)资助,系2016年安徽省教学研究重点项目(2016jyxm0798)的研究成果。

同样的丰富多彩。詹姆斯坚信女性在审美、道德、情感和精神上更胜一筹。

国外对詹姆斯女性人物的研究,形式多样,成果迭出。例如,阿尔弗莱德·哈贝格的《亨利·詹姆斯和“女人事”》(Henry James and the “Woman Business”)从女性主义视点来解读小说;佩吉·麦科马克(Peggy McCormack)在《金钱的规则》(The Rule of Money)一书中把詹姆斯看作女性主义者,指出“他的女性意识来源于他对处在性别交换社会中女性的深切同情”。^[1]他的叙事方式具有女性主义写作的文体特征:间接、典故、含糊其辞和确切含义的破坏。

国内对詹姆斯女性人物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还停留在传统的做法上,大多限于对具体作品中某个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如胡江波的《伊莎贝尔的婚姻选择:一个阅读的隐喻》。^[2]小说中有多处围绕着伊莎贝尔阅读的描写和隐喻,吸引读者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对伊莎贝尔的一生进行解读。陈湛妍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阐释了女主人公悲剧命运与社会伦理观错位的密切关系,指出恰恰是“资本的同质化”导致了主人公伦理观的扭曲错位。^[3]总体上,国内相关研究起步晚,具有巨大的文学阐释和理论探讨的空间。

综而观之,国内外对詹姆斯作品中女性主人公的相关研究,大多数仍然局限于女性批评主义视角下的个别女性研究,但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需要进一步地挖掘与开拓。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联系詹姆斯创作的父权社会背景,从詹姆斯的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出发,分析女性受害者悲惨困境的根源,探讨她们的性格特征和处世态度,由此触及詹姆斯陷于矛盾漩涡中的温柔情怀,并试图揭秘这种柔情及其内在原因。

二、女性形象与挣扎的柔情

(一)顺从女性形象:被抑制的柔情

“男权制统治最有效的方面是对他的女性臣民所实施的经济上的控制”。^[4]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没有经济来源,迫使她们不得不委身于男性的庇护。没有经济地位,也就没有了个性的独立。在父权制社会,大部分女性没有工作,缺乏谋生手段,婚前依赖父亲,婚后依靠丈夫。父权文化赋予父亲绝对的威权,许多女性把父权价值内省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把满足父权和男性压制固化为内在的自我需要,心甘情愿成为驯服顺从的乖乖女。《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帕茜·奥斯蒙德(Pansy Osmond)便是顺从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

帕茜始终生活在父亲奥斯蒙德的庇护下,天真,纯洁,从未接触外面的世界。她没有丝毫独立自主的意识,做事情没有任何主见,完全按照父亲的设计生活着。帕茜自幼就被父亲寄养在修道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世界的认知极其幼稚。在父亲看来,女性在情感、思想上的“空白”,反而是一种美。奥斯蒙德希望女儿学习各种女性礼仪,气质高雅,品质高贵,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淑女典范,以便有朝一日嫁入豪门。

奥斯蒙德独断专权,完全掌握着女儿的命运,一心想把女儿嫁给地位显赫的

沃伯顿伯爵。当他得知女儿深爱着耐得·罗希尔时,便恼羞成怒地再一次把她关进修道院,这充分体现了奥斯蒙德的父权嘴脸。这里所谓的父爱不过是专制的代名词。帕茜如果想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就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以青春、爱情和自主选择的权力换取豪门生涯。她被父亲精心打造成任人选购的商品,换取名利与富贵,却不过是父权制度下物物交换的牺牲品。帕茜的形象代言词是“顺从”“天真”“纯洁”,是当时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在修道院的传统、保守教育下,她养成了服从“权威”的习惯。她压抑自己的真实感情去迎合和取悦别人,不自觉地成为了父权社会下顺从女性形象。

顺从女性形象的背后是詹姆斯被抑制的柔情。他对柔弱女性的同情,映衬了他对父权制度的厌恶与憎恨。当帕茜默默无闻的顺从成为天经地义的祭品时,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却是詹姆斯被压抑的怒火和无言的抗争。女人应是被呵护的,而不是被驯服的。

(二) 双重性格的悲剧女性形象:被分裂的柔情

《英语世界中的女性解构》指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价值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男性决定的。女性符合男权价值的程度越高,女性的价值就越大。女性越能满足男性的感官刺激和财权欲望,女性的可接受度就越高。^[5]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女性甘愿为家庭和丈夫做幕后的牺牲者。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有一类女性富有心机,内心渴望爱情,为了出人头地,不惜出卖良知,违背伦理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而当一切落空万事皆休时,她们丢失的,不仅是渴望已久的爱情,还有理想、信念和人生的意义。她们一方面是父权社会压迫下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沦为富有心机的害人者,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悲剧形象。这类女性形象的代表便是《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梅尔夫人。

梅尔夫人生于美国,但长在欧洲。她气质高贵,举止优雅,精通音乐、绘画、文学等多种艺术,出入上层社交圈进退自如。难以想象她这样的女人,竟遭到丈夫无情的抛弃,孑然一身,感情空虚而落寞,在利益的诱惑下,做了奥斯蒙德的情人,并生下女儿帕茜。梅尔夫人深知自己婚姻不幸,本应自尊自重,却出于个人私欲,与情夫设计陷害天真浪漫的少女伊莎贝尔,以便得到后者丰厚的遗产。作为女人,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作为一个母亲,面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无法相认,梅尔的命运实在是太惨了。

梅尔夫人的悲剧来源于她的奉献精神。在《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的,是用来陪伴亚当的。这就确定了女人天生就是男人附属品的地位。^[6]梅尔夫人深受这一观念的洗脑,甘愿被自私自利的奥斯蒙德利用,为他人做嫁衣,使情人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事成之后,自己不过是一件随时可被丢弃的“旧衣服”而已。

梅尔夫人制造机会接近伊莎贝尔,投其所好,利用自己的知性魅力赢得她的崇拜和信任,之后就把她推入婚姻的陷阱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梅尔夫人不择手段,从一名受害者变为害人者。她是一位具有双重性格的悲剧女性形象。

双重女性形象的背后是詹姆斯被分裂的柔情。梅尔夫人的悲剧一方面来自她的私欲,另一方面来自软弱。詹姆斯同情她,因为她是受害者;詹姆斯鄙视她,因为她是害人者。詹姆斯的柔情呈现着模棱两可的两面性,以一种分裂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勇敢反叛的女斗士形象:一路暴走的柔情

女性主义认为,人类的进步和男性的文明是以压抑女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父权制正是通过对女性的压抑并隐藏这种压抑而得以维系的。妇女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在压抑和反压抑中追寻自我意识和主体存在的历史。^[7]

19世纪中后期,社会上涌现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独立、性格坦率、敢于挑战传统权威的女性形象。与温柔娴静的欧洲淑女相比,她们更加洒脱活泼,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勇于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和挑战。《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伊莎贝尔·阿切尔便是这样的代表,她锐意进取,潇洒面对人生挑战,展现了生活中的强者形象。

女主人公伊莎贝尔是“一个向命运挑战的少女形象”。^[8]她浑身洋溢着新大陆的蓬勃朝气,极度崇尚独立自主的精神,渴望自由、充分、深刻地体验人生。在伊莎贝尔看来,自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价值的荣誉体现,尊严的理想归宿。

伊莎贝尔对婚姻的选择充分证明了她对自由的追求。英国贵族沃伯顿勋爵(Lord Warburton)和美国工业资本家戈德伍德(Gold Wood)先后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却在她坚硬的防守盾牌前败下阵来。因为前者代表着森严的英国等级制度,随之而来的是贵族爵位、繁文缛节等一成不变的事物;后者品味粗俗,专断霸道。两者都代表了一种既定的生活轨道,与伊莎贝尔理想中的自由生活不符。

最终,她冲破世俗的阻挠,嫁给了“半吊子”艺术家奥斯蒙德,一个“没有职业,没有名声,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一切”的人。^[9]伊莎贝尔认为,嫁给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可以摆脱传统和社会习俗的羁绊,随遇而安,挥洒人生,是追求自由、体验自由、实现自由的有效方法。

奥斯蒙德看似风流倜傥、醉心于艺术,摆出一副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姿态,实则平庸肤浅、自私自利,向往飞黄腾达、阔绰体面的贵族生活。婚后,他虚伪丑陋的内心逐渐显露出来。他不仅图谋伊莎贝尔的财产,还想在精神上完全控制她。

伊丽莎白·爱伦(Elizabeth Allan)认为,奥斯蒙德绞尽脑汁,试图迫使伊莎贝尔听从自己的号令。他们之间是主体与客体、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10]在父权社会中,父亲、丈夫是主体,女儿、妻子是客体,这种思想深深流淌在伊莎贝尔的血管里,并指导着她的一言一行。伊莎贝尔痛苦地意识到婚后的生活“不是通向幸福的高处”,而是“通向地底,通向受束缚、受压抑的领域”^[11]。她追求自由的理想在婚姻的“牢笼”里幻灭了。

但伊莎贝尔没有就此屈服,经过反思和顿悟,她对人生、道德和命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内心也走向成熟。最终,她坦然承受自由选择的代价,毅然回归让她痛心疾首的家庭。她的行为,与其说是她的个人信念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妥协

与平衡,不如说是她对婚姻的捍卫和对女性道德的坚守,因为婚姻、理想、道德、自由一直在她的血管里奔流着。放弃婚姻、背离理想、抛开传统、远离自由不仅让她感到羞耻,也让她感到恐惧。^[12]当人生的危机逼近自己时,伊莎贝尔没有胆怯与逃避,而是勇敢面对,妥善处理,不愧为父权社会的女斗士形象。

勇敢反叛女性形象的背后是詹姆斯一路暴走的柔情。在伊莎贝尔的身上,寄托着詹姆斯对女性的热望与期待。詹姆斯在这部小说中生动地刻画了复杂的人性,善良与邪恶、无私与自私、勇敢与怯懦、真诚与狡诈时时交织在一起,上演一幕幕人间大戏。伊莎贝尔的胜利,传达了詹姆斯自己对女性的深刻柔情。高尚的品德、善良的心地和高雅的情操,才是詹姆斯对女性的所有幻想。

三、多变的人生,汹涌的情感:漩涡柔情的原因分析

父权文化体系赋予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威权。在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男性书写的叙事文本,无不打上了父权文化的烙印,男性主导的权利特征是作为神一样存在着的话语标记。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文化语境中,“整个女性的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人们设计女人的命运,从不顾忌女人的切身需要,而是考虑男人对女人的操纵与愚弄。^[13]一部女性形象塑造史就是一部女性被男性操纵和盘剥的历史。女性形象的设置,总是渗透着男性的欲望,表现着男性的虚伪幻想,体现着男性的霸道与控制。男性总是高于女性,超越女性,并按照男性的意愿对女性进行随意的塑造。

无论是驯服顺从的乖乖女、双重性格的悲剧女性,还是勇敢反叛的女斗士,都是詹姆斯塑造的众多栩栩如生女性形象中的一类。詹姆斯描写她们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真实处境、情感生活和心路历程,体现了对女性的关注和深思,传达出对社会、对人生的道德探索,也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自己陷于矛盾漩涡中的柔情。

詹姆斯在《画像》的纽约版序言中,引述乔治·艾略特的话:“人类爱的财富,正是在这些弱女子身上代代下传。”这些“弱女子”们大多富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内在情感。他采用女性视角描写了一个个领先于时代的女性形象,通过她们的不同命运体现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他笔下的“美国女孩”,散发着新大陆的蓬勃朝气,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她们性格天真单纯,处事简单、直接,象征着美国文化中最重要“自由”精神。作为一位有道德有良知的作家,詹姆斯同情女性,关心女性,爱护女性,对女性的善良品质敬佩有加,击节赞叹。

然而,称赞与敬佩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思想矛盾与浓厚的男性意识:婚姻才是女性命运的唯一依托。女性仍被置于边缘位置,活动范围仅囿于金钱、家庭、婚姻爱情的局域。这些女性虽然乐观、坚强、独立、向上,但是,这种独立的精神,却是在男性的庇护与控制下形成的。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个性差异,纵有千差万别,结局大体上是相似的,她们都走不出传统的束缚,逃不出婚姻的围城。这一切表明,男性权威在詹姆斯的叙事话语里无处不在,男性权威与女性弱小构成詹姆斯叙事文本语境中的两条主线,一明一暗,一张一弛,它们彼此交织,衬托

出詹姆斯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纠结。这种矛盾与纠结使得詹姆斯的叙事文本充满了张力,引人入胜。

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前半部分构建了一个向往自由、敢作敢当的伊莎贝尔,特别是她对于婚姻的自由选择,而在后半部分又对这种独立性进行修正,让伊莎贝尔最终回归不幸婚姻,向社会传统妥协,这充分体现了詹姆斯矛盾的情怀,一种被分裂的柔情。

亨利·詹姆斯被杜彼(F. W. Dupee)称誉为“女性文学时代伟大的女性小说家”。^[14]在亨利·詹姆斯看来,所有事情或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关;一切问题最终都与性别有关。因此,考察詹姆斯的性别世界,就是考察他矛盾的女性观,以及为此付出的所有努力。^[15]

詹姆斯在女性问题上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两面性。里昂·艾德尔指出,詹姆斯是“既崇拜女性又害怕她们”,对她们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感,摇摆不定,既温柔同情又迟疑不决。^[16]詹姆斯的女性意识与矛盾的柔情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他的家庭环境、个人成长经历、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詹姆斯的女性意识与他的文化观也息息相关。

首先,詹姆斯的母亲对詹姆斯的成长影响巨大,其独特经历塑造着詹姆斯对女性难以言诉的情感。母亲玛丽·詹姆斯是传统女性中的典型代表,满足了19世纪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要求。她温和、恭顺、有爱心,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相夫教子。“詹姆斯夫人是个模糊的形象,但绝不无足轻重……她的模糊性成了一种价值,尤其是她悲苦的消极性对詹姆斯的影响。”^[17]詹姆斯在赞美母亲对家庭无私奉献的同时,感到母亲在社会中失去了本来的身份,又流露出惋惜和同情之意。詹姆斯在作品中描写了许多与母亲相似处境的女性,她们奋力从父权社会的藩篱中挣脱出来,为争取自由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不懈拼搏。

其次,詹姆斯的父亲也对詹姆斯的女性情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詹姆斯的父亲是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骨子里流淌的都是传统的价值观念,他认为女性是“美德、纯洁和神圣的自我牺牲的化身。”^[18]对于19世纪的女性问题,他从不隐瞒自己的立场,认为婚姻是一个神圣的殿堂,女人只有献出自己才能得到家庭……詹姆斯深受家庭的熏陶,男权至上的思想自幼就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另外,詹姆斯对哥哥的微妙情愫也影响着自己对女性的柔情。父亲偏爱哥哥——威廉·詹姆斯,把他培养成威武阳刚、极具男子气概的人,而母亲偏爱亨利·詹姆斯,受此影响,亨利·詹姆斯温顺、恬静,具有女性细腻丰富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挥之不去的女性情感使亨利·詹姆斯深深陷入对于兄长的迷恋,超出了正常的兄弟之情,显得很不合时宜。1878年,哥哥步入婚姻,这对亨利·詹姆斯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他陷入莫名的无助与寂寞之中,但很快他就将这种情绪转移到了文学创作之中。事实证明,1878年前,詹姆斯的小说中还有男性主人公,1878年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全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人物。这足以表明詹姆斯对女性身份的依恋和自身独特的性心理特征。

再次,詹姆斯对女性的柔情还与他青春期的特殊经历有关。詹姆斯在 18 岁时的一场火灾里遭到了“不言自明”的创伤——这种致命的打击使他产生了性别身份的错乱。心理学家埃德加·弗里登堡曾指出,有些男子害怕与女性交往,他们对恋爱的心理仍然停留在青春期前。^[19]詹姆斯就是这样,他难以摆脱青春期的梦魇,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避,逃避爱情,转而爱上那种可能是他自己化身的美男子阿多尼斯。这种奇特的性别倒错使詹姆斯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一丝慰藉,那就是对女性身份的认同。

同时,詹姆斯的创作经历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影响着他那在矛盾漩涡中挣扎的柔情。詹姆斯在生命中期曾有一个创作转向,即对戏剧的痴迷,但这一转向却以失败告终,不由身心疲惫,这也促使他同情身处相似境遇的弱女子。^[20]

正是由于詹姆斯这种独特的女性情感,他非常理解处在男权主导社会中女性的驯服地位,对女性遇到的种种问题持有精辟深刻的见解。他钟爱时代进步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赞美她们为追求理想和实现自身价值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他在作品中赋予女主人公充分的自由,让读者们考虑女性独立的价值。

最后,詹姆斯对女性的情感还深受当时社会的影响。维多利亚时期男尊女卑,父权至上,女性必须严格地顺从男性,恪守淑女风范;“她必须充满爱心和同情心;她必须具有非凡的魅力;她必须绝对杜绝私心杂念;她必须为家人抵挡风寒;她必须精通持家之术……”^[21]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社会见证了新旧思想的冲突和交锋。随着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蓬勃兴起,父权制度下女性的地位日益提高,她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努力开拓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幸福的追求,对社会与家庭的责任,这些美好的女性品质,也无不感染着亨利·詹姆斯,使他对女性抱有同情,心生敬畏,同时也使他对当时的社会及其习性抱有一丝幻想和忍耐,这也是亨利·詹姆斯笔下不时闪烁人性亮点的重要原因。

四、结 语

詹姆斯作为男性作家却对女性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的洞察力。家庭环境、个人成长环境以及时代背景都深深影响了他对女性的认识和对女性人物的塑造。詹姆斯通过描述她们在游历、求学、情感婚姻道路上的困难来揭示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由绝对的奴役与被奴役到女性的逐渐独立,女性在独立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细微的心理变化。小说中塑造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们也会给予激励与鼓舞,她们显示出来的美德让她们的形象更为光辉,更受人钦佩。

虽然詹姆斯在作品中描写了许多勇于挑战权威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但他绝不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像父亲老詹姆斯一样,他是“精神上的神学家而非社会改革者”,^[22]无数的传记学家和评论家们在总结詹姆斯的特点时都用了“消极性”这一词。日常生活中,詹姆斯通常以消极旁观者的姿态来洞察人类思

维和心理。对于妇女运动,他身为一个严肃缜密的艺术家,绝不是立场鲜明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更加关注个体的精神层面的变化。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詹姆斯的文本形式仍浸染了男权文化的阴影。他通过各种写作手段和叙事策略,美化父权制时期的女性形象,以期她们符合男人的审美标准,契合男权的价值观念,这一初衷仍然难逃对男权文化的礼赞俗套。女性自身也已内化为一个符号,作为男权文化的附属品,认同自身的客体身份和边缘地位,心甘情愿地按照男权的价值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作家,詹姆斯掉入这样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仍然与19世纪欧美社会中父权的深层心理若即若离。

但与那些绝对的男性权威主义者有着本质区别的是,詹姆斯并不是父权制和旧社会价值体系的捍卫者,他同情女性的遭遇,关心女性的成长。只是由于历史原因,他未能对男权文化作彻底批判。自身的成长经历和认识的局限,也使詹姆斯对女性深陷矛盾的漩涡不能自拔,从而与真正超越时代的新女性失之交臂。

注释:

- [1] Peggy McCormack. *The Rule of Money*. London: UMI Research Press, 1990. p. 32.
- [2] 胡江波:《伊莎贝尔的婚姻选择:一个阅读的隐喻》,《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
- [3] 陈湛妍:《伦理错位与心灵的孤独——论〈华盛顿广场〉中凯瑟琳的悲剧命运》,《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
- [4] [美] 凯特·米莉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 [5] [10] 施旻:《英语世界中的女性解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34、39页。
- [6] 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 [7] 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 [8] [美] 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 [9] [11][12] [美] 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 [1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Knopf, 1953. p. 612.
- [14] Virginia C. Fowler. *Henry James's American Girl: The Embroidery on the Canva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5. 143.
- [15] Jonathan Freedm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p. 21.
- [16] Porte, Joel. *New Essays on The Portrait of a Lad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3.
- [17] Dupee, F. W. *Henry James*. London: Methuen Publisher, 1992.
- [18] Kaplan, Fred. *Henry James: the Imagination of Geniu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 inc. c1992, 第16页。
- [19] [英] 查尔斯·铂金·斯诺:《亨利·詹姆斯》,杨艳深译,《外国文艺》1981年第1期,第161页。
- [20] [美] 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556页。
- [21] 译自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Harcourt & Brace Company, 1929. p. 5.
- [22] Annette Niemtow, "Marriage and The New Woman in The Portrait of a Lady", Isabel Archer, ed. and intro.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Publisher, 1992, p. 105.

[责任编辑:李本红]